

司马璐编著

#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第二部

## 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



#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 第二部

### 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

# 目 录

## 第一章 中共临时中央与国内外的组织

- 第一节 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 ( 1 )
- 附录： 劳动者的觉悟……………陈独秀…………… ( 14 )
- 第二节 北京的组织 ( 附天津 )…………… ( 24 )
- 第三节 湖北的组织…………… ( 34 )
- 第四节 湖南的组织…………… ( 43 )
- 附录：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 ( 48 )
- 第五节 广东的组织…………… ( 59 )
- 第六节 国内其他地区的小组织…………… ( 65 )
- 第七节 国外留学生的组织…………… ( 71 )

## 第二章 中共的正式成立

- 第一节 中共正式成文前的大势…………… ( 84 )
- 第二节 中共一大的代表…………… ( 92 )
- 第三节 一大开会的经过…………… ( 101 )
- 附录： 董必武谈中共一大…………… ( 108 )
- 第四节 一大的政治路线斗争…………… ( 114 )
- 第五节 一大的宣言与政纲…………… ( 122 )
- 附录： 中共一大的《党纲》……………陈公博… ( 127 )
-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几个文件  
    ( 摘要 )…………… ( 129 )

### 第三章 中共的初期活动

- 第一节 中共一大以后…………… (138)
- 附录:** 中共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147)
- 第二节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60)
- 第三节 中共二大与杭州会议…………… (168)
- 附录:**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二年七月  
        中共二大通过)…………… (176)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  
        (一九二二年七月)…………… (181)
- 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二年七月)…………… (200)
- 第四节 中共初期中国左右派的文化活动  
        大势…………… (219)
- 附录:** 记党的早期印刷工作和第一个地下  
        印刷厂……………吴贵芳…………… (224)
- 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等… (226)
- 第五节 二七大罢工…………… (232)
- 附录:** 中共中央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  
        工人阶级与国民…………… (239)
- 中国劳动阶级斗争第一幕(摘录)  
        ……………恽代英… (241)

## 第一章 中共临时中央与国内外的组织

### 第一节 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

中国共产党之成立，李大钊、陈独秀二人功不可没。史称为“南陈北李”，陈指陈独秀，因为他的共产主义活动，大部份在南方，故称“南陈”；李指李大钊，因为他的共产主义活动主要在北方，故称“北李”。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时间而言，李大钊比陈独秀为早，就中共初期的创造与奠基的功绩而论，陈独秀之贡献则大过李大钊。

一九二〇年三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等到达北京时，最初接触的对象是李大钊，当时李的态度相当谦虚，他认为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一位有相当声望的人，他建议维丁斯基先与陈独秀谈谈。

维丁斯基到上海以后，与陈独秀“一见如故”（注一），于是陈独秀决定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展开工作。这个最初的组织，在中共史料上，有的称为中共临时中央，有的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有的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于当时还不是一个严密组织，上述不同的说法皆有根据。

现在中共史料中，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也有两个说法，一说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一说是一九二〇年八月。根据中共早期的资料，中共临时中央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在中共没有正式成立以前，有的小组没有正式名

称，有的名称时有变动。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用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个名称，当然可能。笔者判断，上述不同名称的来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维丁斯基与陈独秀晤谈以后；中共临时中央则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八月间，其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注二）也同时在上海宣告成立，陈独秀等人已经具备条件从个别的小组，进入大张旗鼓的活动。此即中共临时中央成立的历史背景。

证明陈独秀等在一九二〇年初已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较权威的资料有共产国际驻中共的代表米夫的一篇文章。米夫说：“一九二〇年初，由北大教授陈独秀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参加者共七人。”（注三）

中共政权成立后，第一个治党史的胡乔木也承认，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胡乔木说：“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上海于同年五月首先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注四）

中共史学家叶蠡生和胡乔木一样，紧接“上海小组”以后强调“各地小组”的地位；但是，同时他们也承认，全国性的“正式的党”，是通过“上海小组”的组织而成的。叶蠡生说：共产国际代表是先“向上海小组建议，应邀集各地小组派出代表，成立正式的党。”（注五）

上述说法证明，“上海小组”当时是全国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带头与指导的中心，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证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存在，或将其径称为中国共产党者，有许多中共原始文字或参予中共创党的人。不过其差别是成立的时间不同，时间不同的理由即在于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二者混为一谈之故。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邓中夏，早在一九三〇年就说过：“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开始的。”（注六）

据延安时代的中共史料，维丁斯基到上海“首先找到了陈独秀，遂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注七）

中共创党人之一李达（注八）说：“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七人，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八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的联络很欠缺。”“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注九）

中共创党人之一包惠僧（栖梧老人）说：“当时陈独秀、李汉俊（注一〇）、沈玄庐等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注一一）加入，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推陈独秀任书记，并向国内外发展组织，相继成立了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山东六个支部。”“临时中央所在地是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此外还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现改铭德里）六号租定一栋两楼两底的房屋，作为党的工作部。”（注一二）

中共创党人之一张国焘说，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注一三）

张国焘的回忆中又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

是一九二〇年八月下旬。张国焘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的最初发起人，也即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注一四）、施存统等七人。”（注一五）

一九二〇年夏秋之间，张国焘正在陈独秀的上海寓所作客。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一九二〇年七月间曾对他谈到组织计划：“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沈玄庐、施存统和俞秀松，“他们三人将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带的组织。”“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张国焘）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武汉的急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先生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他说施存统快要到东京去，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及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事，可由他负责。”（注一六）

张国焘又说：后来，“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后来才知道是维丁斯基和杨明斋。”“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



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注一七）张国焘在这段记述中，证明当时他本人虽在陈独秀家作客，却没有直接参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临时中央的活动。

中共原始资料及当时人的“回忆”，出入很大，正如张国焘所说，参予其事者，“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参加者，许多书刊说是七个人，名单却又不同。其中有五个人是被完全肯定的，即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定一）、施存统（复亮）等。此外有几个人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陈望道，他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应该是肯定的。陈望道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的人，当时正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开始很卖力，但后来表示自己不宜于实际政治活动而退出，他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期。

第二个人是俞秀松，他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也应该是肯定的。俞秀松是当时中共青年运动中最活跃的人，于一九二〇年八月起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后期。

第三个人是戴季陶（注一八），被认为当时对共产主义运动最热心的人，他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也应该是肯定的。但是中共决定创党时，他既没有参加，而且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著名反共理论家。

中共创党人之一陈公博记述说：他在出席上海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听见一件关于戴季陶先生的轶事。季陶

和仲甫（陈独秀）约定共同发起共产党，成立之前一日，季陶来了一封信，说他和国民党的关系太深，的确不能参加共产党组织，不过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正在创办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注一九）

中共创党人之一周佛海说：“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戴季陶）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有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注二〇）

包惠僧（栖梧老人）则说，戴季陶在中共创党时临阵脱逃，是由于“党纲草案中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时，戴季陶也借口他不能同国民党断绝关系，申请退出了这一运动。”（注二一）

关于邵力子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间的关系，许多中共史料都提及，但是却没有特别的记载。

有的记载中说，张东荪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关，张东荪当时提倡社会主义。陈独秀也曾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与张东荪晤谈过。包惠僧（栖梧老人）的回忆中说：“陈独秀介绍维丁斯基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人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当时维丁斯基、陈独秀等“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

是中国社会党。”“这个意见”“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退出了这个运动。”（注二二）

周佛海的回忆中说：他于一九二〇年暑假由日本回国，在上海时，“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注二三）去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访仲甫（陈独秀）。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人俄人维丁斯基在坐。”维丁斯基“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注二四）

所以，最早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人数，根据上述可以肯定的五个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定一）、施存统（复亮）等。如果另外加上陈望道、俞秀松、戴季陶、邵力子等，那么，这个数字应该是九个人。

延安时代的中共史料也说，当时上海小组是八个人而不是七个人。这份资料写道：“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首先加入组织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复亮）、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沈玄庐（定一）等八人。”（注二五）

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临时中央期间，陆续加入组织的有李森（启汉）、刘少奇（注二六）、罗觉（亦农）、傅大庆、彭述之、沈雁冰、袁振英（震瀛）、丁默村（注二七）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物的附件：《中共简史》中说，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有阮啸仙。是不实的，笔者相

信这个阮啸仙系俞秀松之误（注二八）。

中共临时中央的活动，李达的回忆中说：“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征求当时进步青年做团员。上海的团部设在环龙路铭德里六号两楼两底的风子里，挂了‘外国语言学校’的招牌，团员有二十余人，由维丁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同志主持。”（注二九）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的人数，李达说是“二十余人”，包惠僧（栖梧老人）说是“十多个团员”。包说：该团“最初由俞秀松任书记，有十多个团员。这些团员都是准备去莫斯科留学的。青年团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每次都有政治报告。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担任报告的时候多。”（注三〇）

据中共所发表的《青年团历史资料》内容如下：“一九二〇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派了年纪最轻的党员俞秀松、张太雷（注三一）等同志，首先在一部份先进青年中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弼时（注三二）、肖劲光（注三三）就是当时第一批入团的。”（注三四）

当时的外国语言学校，由随同维丁斯基来华的杨明斋担任校长。实际上等于中共临时中央半公开的对外联络机关。包惠僧（栖梧老人）回忆说：“当时党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纪念会’、‘五一劳动节的庆祝会’、‘马克思诞辰纪念’、‘三八妇女节’筹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党的会议不是在老渔阳里二号就是在贝勒路树德里卅号李汉俊家里举行。”（注三五）

包惠僧（栖梧老人）的回忆中又说：“创办外国语言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到莫斯科学习的青年团员补习俄文的。虽然外国语言学校的章程中有英文班、法文班，但是并没有开班授课。俄文班的学生来去无定，最多的时候，有廿余人，最少的时候约十余人，一九二一年春天学生最多。刘少奇同志、罗觉（亦农）同志、傅大庆同志、李启汉（森）同志，都曾经在这个学校里学习俄文。”（注三六）

杨明斋除了主持外国语言学校以外，并于同一地址办华俄通讯社，但是没有经常发稿。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临时中央成立以前，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工人运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八日，午后一时，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代表等开会筹备‘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陈氏演讲劳动要旨。最后，筹备会推陈独秀、汤松为筹备顾问。”（注三七）

陈独秀于五月一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人中发表通俗的演讲，后以《劳动者的觉悟》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及《新青年》杂志发表（注三八）。

中共临时中央成立后，发行了一个专门以工人为对象的《劳动界》周刊。李汉俊负责主编。

《新青年》杂志从一九二〇年九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就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辟有《俄罗斯研究》专栏，执笔者有李汉俊、李大钊、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震瀛）等。“新青年社”从十月起，与上海工商友谊会合作出版《夥友》小报，后来双方意见不合，《夥友》出版至第八

期，《新青年》的人退出，这是中共最早的联合战线与破裂（注三九）。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的三周年紀念，中共临时中央出版《共产党》月刊。据包惠僧（栖梧老人）说：“《新青年》虽然是由党领导，还不能算是党报，于是发刊了一种《共产党月刊》算是党报。”（注四〇）

中共史学家洪焕椿记述，中共临时中央的“《共产党》月刊。在该刊第一号里，除了纪念十月革命的文字以外，还刊载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列宁的著作一览表》、《英国共产党成立》及《列宁在莫斯科苏俄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在第二号中，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党纲》及《美国共产党宣言》。在第四号中，发表了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的一部份，在第五号发表了《劳农制度研究》。”（注四一）

中共临时中央成立以后，陈独秀等“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注四二）最初，这个工会于十月三日在霞飞路渔阳里外国语言学校开发起会，各工厂到会的发起人有七、八十人，另外有参观者六人。（注四三）正式成立时，“会中有主持人作报告，并有参观者演说”，“同年十二月，上海又成立了一个印刷工会”。“这两个工会都有工人们自己主编、发行的刊物，一种是《机器工人》一种是《友世画报》。”（注四四）

在这同时，上海又成立了纺织工会、劳动补习学校等。（注四五）

“一九二〇年秋冬之交，陈独秀到广东，临时中央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注四六）

一九二〇年冬，上海外国语言学校选派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抱朴、廖化平八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到了一九二一年一月间，沈玄庐赴粤，施存统去日本，在上海的党员只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杨明斋等九人了。在这个时间，虽然先后吸收了一些党员，但他们都是有职业的人，没有方法把工作推动。”（注四七）

包惠僧（栖梧老人）说，他当时从武汉带了几个青年团员，本来是经上海预备去莫斯科的，这时就被留在上海临时中央工作。一九二一年“五一”节，“我们的同志一大早就全体出动，在各公司、工厂、电车、公共汽车上散发传单、贴标语，我们有两个同志跑到先施、永安两公司七层楼上把大批传单向南京路散发。在天后宫举行的群众大会虽然到的人不多，会开得不算好，我们的传单标语却散发得很普遍。《民国日报》、《时事新报》还发表了社论，《申报》、《新闻报》、《商报》以及其他大小报纸，凡是同情新文化运动的，都作了新闻报导。”这次会议引起了法国巡捕搜查新渔阳里六号，外国语言学校受到口头警告。“事后李汉俊召集了一次党员会议，他主张把临时中央迁到广州，或是要陈独秀回上海再行部署工作。”（注四八）

据当时中共机关刊物《共产党》记载，李汉俊代理书记时代的中共临时中央，于一九二一年六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发表宣言。宣言中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事业是要发展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

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密切关系。”（注四九）

中国劳动组合发刊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说：“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一个中国全体劳动者言论机关。”又说：“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注五〇）

包惠僧（栖梧老人）的回忆中提到，法国巡捕搜查过外国语言学校以后，“住在这里的一些学俄文的青年团员怕出乱子，差不多都悄悄地搬走了。”（注五一）这段故事与中共另一份官方史料很是符合的。

据中共的《青年团历史资料》中说：“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于当时入团的分子很复杂”，“形成组织涣散，加以缺乏领导骨干，社会主义青年团陷于停顿。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张太雷受了少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重新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注五二）

一九二一年六月至七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代表中有中国人参加。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参加的，有五派之多。据当时以中国社会党领袖名义参加的江亢虎记述：这五个中国共产党派系是，“自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张君、于君二人来俄，适值国际大会时，遂自承中国共产党代表，俄人欢迎而承认之，是为第一共产党。嗣后，青年团学生陆续入俄，改称少年共产党，而后来者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黑龙江省之



黑河中国社会党之旧支部，自部长刘谦遇害，有龚君、于君者，率众避入俄境，改组中国共产党，是为第三共产党。有杭人张君者，只身游俄，自称支那共产党之代表，是为第四共产党。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已为专使，是为第五共产党。此五党者各不相能，而皆自以为是，互为正统之争。第二党人数最盛（约三十），已订期特开大会宣布他党之僭称，对姚尤为激昂，正不知结果如何也。”（注五三）

江亢虎的记述中，张君、于君可能为张太雷与于树德（注五四），他们所代表的被称为“第一共产党”，这“第一共产党”是否正式代表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无足够史证。不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张太雷和于树德都属于中共著名的活跃分子。江亢虎所称的“少年共产党”可能即赵世炎、陈延年在法国组织的“少年共产团”。当时该团团员因不能在法国立足，很多转去苏联学习。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同时接纳互相敌对的，自称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派系，也接纳非共的中国社会党参加，可见当时几个历史背景：

其一、共产国际领导层本身的混乱，每一个自称中国共产党的派系，能够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当然都有一定的国际关系。

其二、维丁斯基与杨明斋等人对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安排，尚未获得共产国际充份的支持。

其三、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缺乏了解与信任，因此采取多头下注的政策。